

《春秋》学与明末清初虞山诗学的演进

王彦明¹

【摘要】在钱谦益家族引领下，虞山诗派形成了绵延百余年的《春秋》学传统。一方面，他们从《春秋》的研阅实践出发，构建通经汲古的经学传统，造就了虞山诗学的“学人气象”；另一方面，基于《春秋》兼具经、史的特性，他们重视史书修撰，倡导诗以存史，构建杜甫的“诗史”典范。同时，“隐而微”的《春秋》笔法，本就带有“存史”“写心”双重意蕴，他们借径李商隐以学杜甫，将心灵感悟包裹在重重典故、意象之下，“隐迷”诗风的背后透露出高超的“写心艺术”。经学、史学、诗学圆融的《春秋》学体系，不仅为虞山诗学提供了活水源头，也助益于清代考据学传统的生成和诗学思想的演进。

【关键词】虞山诗派 《春秋》学 通经汲古 写心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6.2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A **【文章编号】**1004—518X（2021）05—0110—09

虞山诗派是以江苏常熟（又称虞山）为中心的区域性诗歌流派，与云间派、娄东派并称江南三大诗派。它以钱谦益为宗主，以冯班、冯舒、钱陆灿、钱曾、严熊、瞿式耜等为辅翼，以王应奎、赵执信等为后劲，发端于晚明，至康熙、乾隆年间绵延不息，在明季清初诗学演进中居重要地位。罗时进称其“气局之大，承传之久，影响之巨，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最后近三百年的历史，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”^{[1] (P135)}。这也引起了学界的充分关注，诸如何振球、罗时进、李弗民、赵炜等人的研究¹，较为清晰地勾勒出虞山诗派的发展进程、诗学思想及理论分歧，殊具启发意义。虞山诗派推崇学有本源，倡导由经入史、兼及子集的诗学进路，带有明显的“学人气度”^{[1] (P135)}。在钱谦益家族（以下简称钱氏家族）引领示范下，家族、姻亲、师友等多重因素钩锁连环，自明嘉靖至清康熙，虞山诗派形成了绵延 130 余年的《春秋》学传统。遗憾的是，学术界或因他们无《春秋》学著述传世，除孙之梅、严志雄等少数学者在考察钱谦益诗学理论、经学思想时偶有涉猎外²，尚有诸多待发之覆。因此，钩沉虞山诗派《春秋》学的生成，并结合其学术思想和创作实践，剖解虞山诗学的生成、内蕴，揭示它对明季清初学术传统和诗学思想的影响，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一、虞山诗派《春秋》学的生成

区域学术文化传统的生成，往往由地方望族引领示范，而家学传统亦多发轫于族中先哲的成功实践，且经数代传承不息。虞山诗派的《春秋》学传统亦复如是。盖此诗派作为专有名词使用，最早见于清嘉庆年间单学傅的《海虞诗话》。然细究之，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钱谦益所作《虞山诗约序》，已透露出虞山诗人群体创作倾向的生成。因此，以钱谦益所属虞山钱氏为中心，探寻虞山诗派的《春秋》学传统，是符合历史实情的。

虞山钱氏源出吴越，宋末元初始迁常熟。它由外迁异姓成长为虞山望族，得益于以《春秋》中第的家学传统，此发端于钱谦益曾祖钱体仁。体仁（1509—1574），字长卿，“通经史，习书法”，极重庭训，尝“延请名师宿儒，自为除舍，朝夕上食，如事家人”^{[2] (P155)}。长子钱顺时诞生时，卜者称“鸛鹄来巢，书于《春秋》，生儿当以《春秋》举”^{[2] (P159)}。体仁遵其言，延师以《春秋》教之。钱顺时“不踰年辄熟烂”^{[2] (P159)}，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）“会试举《春秋》第一”^{[3] (P1634)}。次子钱顺德亦幼习之，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以《春秋》成进士。顺时子钱世扬幼承父叔之教，习《春秋》。钱谦益称：“家世授胡氏《春秋》，训故

¹作者简介：王彦明，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。（江西南昌 330022）

基金项目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明清释家别集整理与研究”（20&ZD269）；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“钱谦益年谱长编”（2018M642598）；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“晚明佛教文学研究”（2019T120565）

充栋。先君网罗放失，搜逖疑互。老师宿儒，穷老尽气，莫知原本者，莫不泝流穷源，了若指掌。”^{[2] (P739)} 钱世扬曾著“《春秋说》十卷”^{[2] (P744)}，可惜不存；又“采剡正史中异闻奇事，可以耸见闻、资劝戒者”^{[4] (P1493)}，撰《古史谈苑》三十六卷，以寓“《春秋》之志”^{[3] (P1637)}。世扬子钱谦益承家学，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以《春秋》中式。《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进士序齿录》载钱谦益“治《春秋》”^[5]，惜后半残缺。《明神宗实录》载是年闰三月初四，“授一甲第一名韩敬为修撰，二名马之骐、三名钱谦益俱编修”^[6]，知廷试一甲第三名，即探花。他晚年亦以《春秋》教诸子孙，如去世前半年所作《病榻消寒杂咏》其六云：“稚孙仍读鲁《春秋》，蠹简还从屋角搜。”^{[4] (P640)} 所谓“三传《春秋》推武库，一门簪笏俨灵光”^{[3] (P341)}，称《春秋》为钱氏家学，殆不为过。

钱谦益本支祖孙三进士，自然成为虞山钱氏翘楚。旁系宗亲钦羨之余，颇有追慕之意。如钱时俊撰有《春秋胡传翼》，钱谦益称是书为“胡氏功臣”，“导明经者之先路”^{[7] (P104)}。时俊子钱裔肃，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，“以《春秋》举顺天”^{[4] (P1148)}。裔肃子钱曾，随钱谦益习《春秋》，“予昔侍牧翁于云上轩，晨夕伏承绪言，每叹此书（按：指《春王正月考》）绝佳，问津知涂，幸免冥行摘埴，皆先生之训也”^{[8] (P68)}。其《读书敏求记》中，对《春秋经传集解》、陆淳《春秋微旨》、赵沅《春秋师说》等皆有题跋，概见浸染之深。虞山诗派另一成员钱陆灿，曾手批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，今藏国家图书馆。该本钤有“陆灿”“湘灵”等印。后附嘉庆二十三年四月李兆洛《跋钱湘灵先生批左传》，光绪辛卯正月，义州李葆恂又跋之，足见诸人珍爱之情。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），钱陆灿批校明金陵抱青阁十乘楼刻本《增补春秋左传杜林合注》，钤“钱陆灿印”诸印，乃其八十一岁装订、八十二岁以后续笔的第四阅本。^[9]

由钱谦益一支至虞山诗派，《春秋》学已成蔓延之势，这又得益于钱世扬的科举教育。钱世扬举业多舛，退而筑吹藜阁授《春秋》，虞山子弟多随之学。声名较显著者有：（1）翁应祥、翁宪祥兄弟。翁应祥，字兆吉，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）举人，“有《杭州集》《云朔集》《苜蓿斋集》《归田集》行世”^[10]。钱谦益《赠翁朔州兆吉二首》自注云：“朔州为先夫子高足弟子。吹藜阁，先夫子授经处也。”^{[3] (P341)} 翁宪祥，字兆隆，万历二十七年《春秋》房进士，房主邹德溥，会试“三甲五十六名”^[11]。兆隆子汉馨以《春秋》举崇祯壬午（1642）进士，著《春秋备要》三十卷，“以胡《传》为主，亦节录《左氏》以明事之本末”^{[12] (P254)}，钱谦益称“得《春秋》之深者”^{[2] (P435)}。（2）何允澄、何允泓兄弟。此二人“皆执经于先夫子”，其中何允澄“少授《春秋》，经传疑互，能通晓大义”^{[2] (P768)}。（3）瞿纯仁。瞿纯仁幼随钱世扬习《春秋》，与钱谦益结拂水文社，称“吾往从尊府先生授《春秋》，见子之长与书案等耳”^{[3] (P1373)}。（4）许儒。许儒“授《春秋》于先宫保，为入室弟子”^{[4] (P1053)}。他以文、武二经教子，“文经除《尔雅》，加《家语》、胡氏传为十四”^{[4] (P1053)}，子士柔举天启壬戌（1622）进士。故晚明虞山《春秋》学之盛，钱世扬功不可没。他与张尚友分门授徒，称“吴中治《春秋》者，皆名为两家弟子”^{[3] (P1539)}，不无自得之意。

虞山以《春秋》传家者，尚有冯班、冯舒家族和严熊家族。冯班、冯舒曾亲炙钱谦益，其父冯复京撰《六家物名疏》，“其所采集自六经、正史以至诸子百家、稗官小说，与夫讖纬、医卜、天文、历数诸书，无不搜引连类”^{[13] (P30)}。其中，引《春秋》者17部。冯班亦视《春秋》为家庭教育之典范。他认为，一家之是非标准，当以孔子为准衡，“孔子之是非，乃千古不易之道也，‘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’，一部《春秋》不过如此”^{[14] (P20)}。在《家戒》中，他反复强调《春秋》的教化之功，如称：“朱子云：‘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善说道理’。今之读《春秋》者，可不知道理乎！”^{[14] (P123)} 虞山严氏家族，亦视《春秋》为家学。严訥以《诗经》举嘉靖十六年（1537）举人，嘉靖二十年（1541）进士，亦精研《春秋》，著有“《春秋国华》等书”^[10]。故自訥孙严栻始，此家族便转向《春秋》。崇祯三年（1630），栻携五岁子严熊应举，崇祯七年（1634），以《春秋》成进士^[15]。故严熊《贡院局中限韵》云：“数卷堆胸空岁月，一经传世有《春秋》。”句末自注：“崇祯甲戌（1634），先君以《春秋》捷南宫，今惇儿亦习是经，五试棘闱矣。”^{[16] (P125)} 严熊身经国变，落寞里居，以耕读教子为乐，冀望子孙绍继家风。其子严惇六岁就外傅，习《春秋》，严熊每以祖业相期。如《除夕怀惇儿在燕》称严惇“六岁就外傅，法祖诲颇勤”，自注云：“先君以《春秋》发科，惇儿亦习是经。”^{[16] (P159)} 《怀惇儿在燕》又云：“循环天运如周复，法祖麟经六岁传。”句末注曰：“先府君以《春秋》举前庚午（1630）乡试，惇儿幼习是经，今年庚午（1690），以法祖期之也。”^{[16] (P158)} 在此六十年间，他们饱经沧桑，然《春秋》传统从未断绝。

可以说，由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）钱顺时“会试举《春秋》第一”，至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严熊以《春秋》教子，此130

余年恰为虞山诗派的鼎盛期。由钱氏开创的《春秋》学传统，蔓延至冯氏、严氏、翁氏、何氏、瞿式、许氏等虞山望族。称《春秋》为虞山诗派学养之源，殆不为过。

二、《春秋》学与通经汲古的学术传统

虞山诗派虽有“学人”“诗人”之异，然“学人”乃“诗人”之本，“学人气度”是其典型特征。他们基于《春秋》学的研阅实践，确立了通经汲古的学术传统，为“学人气度”的养成提供了活水源头。

明代《春秋》科，专取《春秋胡氏传》。故此诗派之《春秋》学，多发端于《胡氏传》。如钱谦益自称：“仆家世授《春秋》，儿时习胡《传》，粗通句读。”^{[4] (P1316)}以《胡氏传》为基础，衍生出的《春秋》类科举著述，亦为研习重心。举其大者，则有：（1）邹德溥的《春秋匡解》。邹德溥乃江右理学名家邹守益之孙，其《春秋匡解》，“专拟《春秋》合题，每题拟一破题，下引胡传作注，又讲究作文之法”，四库馆臣一度疑为“坊刻伪托”。^{[12] (P248)}钱谦益儿时，钱世扬“授以《匡解》一编”，曰：“此安成邹汝光先生所删定也。”后来，钱谦益“乡、会二试，以先生之书得俊”。^{[3] (P876)}（2）赵恒的《春秋录疑》。是书“本胡氏《传》而敷衍其意，专为科举而设。故经文可为试题者，每条各于讲义之末，总括二语，如制艺之破题。其合题亦附于后，标所以互勘对举之意”^{[12] (P247)}。钱谦益在父亲指导下研习之，如其在《与严正开书》中称：“犹记儿时，先官保授以《春秋录疑》，训之曰：‘此晋江赵恒夫先生所著也。’”^{[4] (P1318)}

然而，由于事涉晚明党争，中第者功名亦多不显。他们优游林下，家富藏书，精于赏鉴，诸如钱谦益之绛云楼、钱曾之述古堂等，享誉江南。毛晋汲古阁之典藏刊刻，亦有盛名。彼此商讨旧学，腹笥益博，识见亦精。他们省思明代《春秋》学现状，批驳虚浮学风。如钱谦益认为，唐代“舍传以求经”，肇开凿空好新之习，学者“入主出奴，三传皆茫无质的，而《春秋》之大义益晦”。^{[4] (P1316)}至明，此风愈演愈烈，尤以明初熊过《春秋明志录》和明中叶季本《春秋私考》为重。关于《春秋明志录》，钱谦益称：“本朝富顺熊过有《春秋明志录》，援据该博，而于彭山李氏杜撰不根之说，亦有取焉，则亦好新说之过也。”^{[4] (P1316)}四库馆臣亦称是书“凿空立说”“出于臆断”“意造事迹”^{[12] (P231)}。至若季本的《春秋私考》，钱谦益跋云：“近代之经学，凿空杜撰，纰缪不经，未有甚于季本者也。本著《春秋私考》，于惠公仲子则曰隐公之母；盗杀郑三卿则曰戊虎牢之诸侯使刺客杀之。此何异于中风病鬼，而世儒犹传道之，不亦悲乎！”^{[3] (P1753-1754)}据史言，鲁桓公生母系仲子，鲁隐公生母为声子。凡此史实之误，盖起季氏于九原，亦不容置喙。四库馆臣阴承之，如“《春秋私考》提要”称：“本不信三传，故释经处谬戾不可胜举。如言惠公仲子非桓公之母……未育于二千余年之后，杜撰事迹，以改易旧文者。盖讲学家之恣横，至明代而极矣。”^{[12] (P246-247)}无论是所举例证，抑或对明代“杜撰事迹”“恣横”学风之批驳，显然受钱谦益影响。

为力纠明代《春秋》学虚浮之弊，他们倡导“据传以通经，据经以订传”^{[4] (P1317)}的学术路径，着意构建通经汲古的虞山之学。钱谦益在为毛晋所刻《十三经注疏》序中说：“《十三经》之有传注、笺解、义疏也，肇于汉、晋，粹于唐，而是正于宋。”^{[3] (P850)}由宋代之王安石、朱熹，至明代之王守仁，经学数变，“熙宁中，王介甫凭借一家之学，创为新义，而经学一变。淳熙中，朱元晦折衷诸儒之学，集为传注，而经学再变”^{[3] (P850)}，“自儒林道学之术分歧于儒家，而古学一变，自江门、姚江之学侧出于经术，而古学再变”^{[4] (P850)}。其结果却是每况愈下，“经学之熄也，降而为经义；道学之偷也，流而为俗学”^{[3] (P851)}，“于是乎封鄙之以制科之帖括，沦乱之以剽贼之词章，举世胥变为俗学，而江河之流不可复返矣”^{[4] (P851)}。轻材小儒嗤点六经，皆毁三传，“生心而害政，作政而害事，学术蛊坏，世道偏颇”^{[3] (P851)}，经学与大明国运并衰，甚有亡国之虞，唯通经汲古、反经明教以挽之，“诚欲正人心，必自反经始；诚欲反经，必自正经学始”^{[3] (P851)}。正人心之要在“反经”，“正经学”之途在越宋明而归汉唐。他以杜预为例释云：“学者之治经也，必以汉人为宗主，如杜预所谓原始要终。寻其枝叶，究其所穷，优而柔之，展而饫之，涣然冰释，怡然理顺，然后抉摘异同，疏通凝滞。汉不足求之于唐，唐不足求之于宋，唐、宋皆不足，然后求之近代。庶几圣贤之门仞可窥，儒先之铃键可得也。”^{[3] (P1706)}受钱谦益影响，虞山诗人多能潜心问学，青灯黄卷，终老不辍。如冯班称：“虞山多诗人，以读书博闻者为宗，情动于中，形于外，未尝不学古人也……东涧老人亡来，流风未泯，作者间出。”从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、毛晋《隐湖题跋》以及冯舒、冯班、钱陆灿诸人的古籍评点来看，冯班所言不虚。就诗法言，“读书”“学识”便为重中之重。如冯班云：“余不能教人作诗，然喜劝人读书。有一分学识，便有一分文章。但得古今十分贯穿，自然才力百倍。

相识中多有天性自能诗者，然学问不深，往往使才不尽。”^{[14] (P53)}

虞山诗人不唯口头倡导，亦付诸躬行。这不仅成就了虞山诗学的“学人气度”，且对清代学术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今人论及清代考据学，每归功于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，殊不知虞山诗派已先发其端绪。如清初考据大家阎若璩从考据学的立场出发，称：“博而能精，上下五百年，纵横一万里，仅仅得三人焉，曰钱牧斋宗伯也，顾亭林处士也，及先生（按：指黄宗羲）而三。”^{[17] (P133)} 又《与戴唐器》云：“弟此等考证辨析，在古人中亦属绝学，不论今人……生平所心摹手追者，钱也、顾也、黄也。”^{[17] (P178)} 在阎若璩看来，钱谦益俨然成为清代考证学的“头号宗师”^{[18] (P59)}。且此三人中，黄宗羲曾亲炙牧斋，为绉云楼之常客。钱谦益歿后，黄宗羲作《八哀诗·钱宗伯牧斋》，称：“四海宗盟五十年，心期末后与谁传。”以考据精审著称的四库馆臣，诋钱谦益“颠倒贤奸，彝良泯绝”“颠倒是非，黑白混淆”。然而，他们所撰《春秋》类提要，承袭牧斋处颇夥，更遑论他书了。又如近世著名学者梁启超称：“（清）一代学术几为江、浙、皖三省所独占……考证学盛于江南。”^{[19] (P4015)} 若就缘起而言，盖滥觞于钱谦益。如钱氏所撰《楞严经疏解蒙钞》，“总算是佛典注释里头一部好书”^{[19] (P8977)}。

可以说，虞山诗派基于《春秋》的研读实践，反思明代虚浮之风，确立了通经汲古、反经明教的虞山之学。这不仅养成了他们的学者气象，也有助于清代考据学传统的生成。钱仲联云：“虞山诗派，明末清初转移一代风会者也。”^{[20] (P1)} 洵为确论。

三、诗史圆融的诗学实践

从通经汲古的经学传统出发，虞山诗派倡导由经入史、下及子集的诗学进路。他们以经为权、度，以史为轻重、长短，所谓：“经犹权也，史则衡之有轻重也。经犹度也，史则尺之有长短也。”^{[4] (P679-680)} 由经入史，是儒者养成之蹊径，亦为学者必经之途程。盖“古之学者，自童卯之始，《十三经》之文，画以岁月，期于默记。又推之于迁、固、范曄之书，基本既立，而后遍观历代之史，参于秦、汉以来之子书，古今撰定之集录，犹舟之有舵，而后可以涉川也，犹称之有衡，而后可以辨物也。”^{[3] (P1115)} 如此一来，“经术既熟，然后从事于子史典志之学，泛览博采，皆还而中其章程，隳其绳墨”^{[3] (P853)}，于是“儒者之道大备”，出而为名卿大夫，以效国家之用。钱陆灿亦云：“先经后史，下逮诸子百家，源流井井。”^[21]

在此观照视阈下，虞山诗派颇重史学。如，钱谦益甫中进士便授职翰林院，天启年间又参与纂修《神宗实录》，得阅内府秘藏。降清后，充《明史》副总裁。他每以“旧史氏”“旧史官”“野史氏”自称，史官是他颇为看重的身份标识。他以深沉的史官意识，秉承实录原则，探寻“信史”的撰修路径，提出了以国史为经，以野史、家乘为纬的总体理念，强调“开国之功宜录”“革除之节宜录”“抗节之贤当录”“理学之贤当录”^{[3] (P1854)} 的撰述内容，倡导“讨论贯穿，先理长编事略之属”^{[2] (P491)} 的编撰方法。明亡后，他的修史之愿更加强烈。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他上疏福王朱由崧，愿仿司马光之先例，“即家开局”^{[22] (P12)}。建文朝史事沉晦不彰，他深以为愧：“祖宗功德，泯灭于余一人之手，魂魄私憾，宁有穷乎？”^{[4] (P683)} 在此重史、存史意识驱动下，虞山诗派的修史实践颇值得关注。就国史言，钱谦益在明亡前已完成了《国初群雄事略》《太祖实录辨证》等史著。明亡后，他又网罗明代史料，撰修明史，惜书未成而毁于绉云楼之火。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间，钱陆灿、严熊等人纂修《（康熙）常熟县志》，又参与编修《江南通志》。严熊《漫兴二十六首次钱遵王韵》其十七称：“三钱鸡笔绍《春秋》，谁卧元龙百尺楼。宋史繁芜唐史谬，纷纷未数万毛牛。”句末注曰：“去夏，同湘灵修《常熟县志》，秋冬之交，与修《江南通志》，今皆告成。”^{[16] (P126)} 此乃区域之史。再如，钱谦益撰有《牧斋晚年家乘文》，钱陆灿撰有《河阳钱氏家谱略》，载录虞山钱氏源流，此乃家族之史。由国史至区域史再至家族史，虞山诗派修史重史颇得后人赞誉。如素以气节著称的黄道周，就义前对友人说：“虞山尚在，国史犹未死也。”^{[4] (P687)} 这透出虞山诗派修史风习在晚明清初之影响。

虞山诗派的重史意识，表现在诗学层面，便是诗史意识的高扬。他们秉持“六经皆史”的理念，称：“六经，史之宗统也。六经之中皆有史，不独《春秋》三传也。”^{[4] (P1310)} 《诗经》不仅是先秦诗歌总集，更有载录历史之用。由先秦时期“诗”“史”混一，至三代以后“诗”“史”分途，二者间的血脉因缘从未中断。故而，钱谦益将观照目光转向了两晋诗学，称：“三代以降，史自史，诗自诗，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。曹之《赠白马》，阮之《咏怀》，刘之《扶风》，张之《七哀》，千古之兴亡升降，感叹悲愤，皆于诗发之。驯至于少陵，而诗中之史大备，天下称之曰诗史。”^{[4] (P800)} 从崇祯六年（1633）至康熙三年（1664），

在此三十余年间，钱谦益倾尽半生精力，发掘杜诗的“诗史”价值，著成《钱注杜诗》，终为杜氏功臣。是书的最大特色，乃在“诗史互证”。陈寅恪曰：“牧斋之注杜，尤注意诗史一点，在此之前，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，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，尚未之见也。”^{[23] (P993)}由晚唐孟棨首次拈出，经钱谦益阐释发明，杜诗的“诗史”价值遂大彰于天下。钱谦益自称“凿开鸿蒙，手洗日月”^{[24] (P4)}，不无自得之意。

如此一来，便顺理成章地确立了杜甫在虞山诗学中的典范地位，尊杜也成为其主导面向。如，陈璧《集唐》云：“看到明皇天宝后，尤于老杜意偏长。”^{[25] (P47)}至钱陆灿，更是声称“诗，非杜弗学也，亦誓不杜不止”，其批点杜集，至有六七遍者。如，上海图书馆藏有其批点《杜工部集》，以《钱注杜诗》为底本，钤有“钱陆灿之印”“调运斋”等印，于钱笺或依或否或补，每有发明。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）十月，钱陆灿参与了“每月于花时晴日祀子美”的浣花会。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，钱陆灿去世近十年后，又得以在浣花会中陪祀杜甫。同时，虞山诗人以“诗史”之笔，载录了晚明清初波诡云谲的历史变局。如，钱谦益、钱曾、陈璧等人作百韵长诗，哀悼常熟籍南明殉难英雄瞿式耜，“直摩少陵之垒”^{[26] (P205)}。又如，钱谦益所作百余首《后秋兴》组诗，“实为明清之诗史，较杜陵尤胜一筹，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”^{[23] (P1169)}。

在此“诗史”观念下，诗歌显然承担着记录历史的重要职责。孔子删《诗》、作《春秋》，同为存史。钱谦益称：“《春秋》未作以前之诗，皆国史也。人知夫子之删《诗》，不知其为定史。人知夫子之作《春秋》，不知其为续《诗》。《诗》也，《书》也，《春秋》也，首尾为一书，离而三之者也。”^{[4] (P800)}以《诗经》代表的诗学传统，与《尚书》《春秋》的史学传统交相融汇，诗歌也就担负着存史、续史之功。后人对前代诗歌的整理，也就隐含着借“删诗”以“定史”的深层意蕴。这为董理明代诗歌奠定了理论基础。天启初年，钱谦益受程嘉燧“《中州》之诗，亦金源之史”启发，“撰次国朝诗集几三十家”^{[4] (P678)}，未几罢去。入清后，钱谦益重理旧业。顺治五年（1648）岁暮，钱谦益至金陵拜谒遗民领袖林古度，见架上残帙，怆然发出“可怜野史亭前叟，掇拾残丛话甲申”^{[4] (P41)}的感慨。此中有凄凉，有悔恨，更有以元好问自励，为存明诗而矢志不渝。顺治六年（1649），钱谦益狱解还乡，书亦脱稿。几经权衡，他将原定之“国朝诗集”易名“列朝诗集”，交付毛晋刊行。次年，绎云楼火，钱谦益毕生珍藏毁之一炬，幸是书先付梓而脱烛龙之厄。该书选录明代诗人1832家，尤重网罗底层文士之作，庶可实现了“存诗”“定史”的初衷。此外，冯舒亦如钱谦益般，仿《中州集》之例，编《怀旧集》，收录同邑23位友人之作，但书甲子，不书清廷年号。其后王应奎苦心搜访二十年，仿《中州集》《列朝诗集》之例，“以诗存人也，而亦以人存诗”^{[27] (P652)}，选录清代常熟诗人182家1888首诗，系以小传，编著《海虞诗苑》。道光年间，虞山著名藏书家瞿绍基进一步网罗放佚，编成《海虞诗苑续编》。二书前后相继，已然勾勒出虞山诗派的发展谱系，成为保留地方诗歌文献的力作。

四、“微而彰”的写心艺术

纵观明代诗学之演进，堪称“师古”“师心”的争衡史。在阳明心学和性灵诗学的双重激荡下，“师心”渐成晚明诗学的主调。虞山诗学上承公安三袁、汤显祖，从复古派的禁锢中破茧而出。钱谦益“灵心”“世运”“学问”三位一体的诗学体系，堪称虞山诗学总纲。故虞山诗学重学问，重史，亦重写心。由此出发，《春秋》俨然成为“治心”之书。如，冯舒《代泉州刺史重刻心史序》云：“《春秋》者，治心之书也。孔子以匹夫操袞钺，无其事，无其时，而乱臣贼子惧惧者。何惧？以心也……心与事判然为两强，而比焉，非《春秋》也。”^{[13] (P92)}“心”“事”不可剖判为二，存史与写心亦应圆融如一。

《春秋》之“治心”，盖通过历史事件的隐晦书写，传达政治、道德判断，尤以杜预的“三体五例”说为著。他在《春秋序》中，称孔子修《春秋》，“发传之体有三”：一曰“发凡正例”，二曰“新意变例”，三曰“归趣非例”。此谓之“三体”，盖就《春秋》的书法原则而言。其后，杜预又拈出“五例”：一曰“微而显”，二曰“志而晦”，三曰“婉而成章”，四曰“尽而不汙”，五曰“惩恶而劝善”。^{[28] (P3700-3703)}“三体五例”的共同特征是借用隐晦性的修辞手法和“引事比类”的托喻系统，阐释《春秋》的道德劝诫和政治旨趣，“存史”与“写心”兼重。对此，虞山诗人至为熟谙。如钱谦益对孟子的“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”下一转语，称：“今将曰《春秋》亡而后《诗》作也。”^{[4] (P914)}实着眼于“《诗》《春秋》之大指，明王道、扶世运”，表彰“尊周攘夷”的《春秋》微旨。这显然与《春秋胡氏传》“多存托讽时事之心”^{[29] (P255)}相关。钱谦益认为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“考正国史，刊正君臣华夏之大经大法”^{[4] (P817)}，本就蕴含“尊周攘夷”之意。成书于北宋末年的《胡氏传》，维护以华夏

为主体的大一统思想，恰与明朝建极、结束蒙元“夷族”之统治暗合，故受明廷眷顾。入清后，虞山诗人遭逢清朝“夷族”统治，面临文化认同之巨变。他们极力宣扬《春秋》之“攘夷”，不仅为反清志士提供了思想、舆论支撑，更通过隐晦性的笔法抒写内心感触，构建出独特的“明遗民性诗学”。^{[30] (P23-84)}

虞山诗人发掘杜甫“诗史”价值时，已然注意到杜诗“微言大义”背后的写心艺术。钱谦益笺杜甫《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》，称：“‘身退’以下四句，一篇讽谕之意，总见于此。”^{[24] (P278)} 他着重剖解杜诗微旨，实与杜预以“三体五例”释《春秋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而将写心艺术发挥到极致的，当属李商隐。李氏“当南北水火，中外箝结，若暗而欲言也，若魔而求寤也，不得不纡曲其指，诞漫其辞，婉变托寄，隐谜连比”^{[4] (P704)}。钱龙惕亦曰：“义山成名于文宗开成之年，仕于武、宣之际。

其时南北水火，牛李恩怨。义山浮沉下僚而实被钩党之祸，故其诗抑扬怨诽，呼愤抑塞。”^[31]发之于诗，迂曲隐谜。故王安石称：“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，唯义山一人而已。”^{[32] (P399)} 元代诗人亦“惩西江学杜之弊，往往跻义山，桃少陵”^{[4] (P703)}。借径李商隐以学杜甫，成为虞山诗派的一大诗学取向。如石林道源云：“吾以为义山之诗，推原其志义，可以鼓吹少陵。”^{[4] (P704)} 钱龙惕亦称李商隐“上薄《风》《骚》，下该沈、宋，升少陵之堂而入其室矣”^{[33] (P216)}。他们慨于“无人作郑笺”的诗史遗憾，在钱谦益推动下，石林道源、钱龙惕等勾隐探赜，开启了清代李义山诗笺注之热潮。诸如冯班、冯舒、钱良择等人，也都以诗学李商隐著称。

虞山诗人大多经历明清鼎革，面临清初严酷的文化监控，其身世遭迹、心理感触，与杜甫遭逢安史之乱、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“若暗而欲言也，若魔而求寤也”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发之于诗，他们不得不把诗心包裹在重重典故之下，如严熊所云：“诗文一道，故事中须再加故事，意思中须再加意思。”^{[34] (P139)} 形成了以“隐谜”为主的创作倾向。进退失据的钱谦益，堪称此风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。他颇为自嘲地辩解道，晚年诗文“用事奥僻”，盖因“苦畏”“苦贫”，“苦畏之病，仆所独也；苦贫之病，众所同也”。^{[4] (P1366)}

对于“苦畏”，钱谦益释曰：“昔者夫子作《春秋》，度秦至汉，始著竹帛。以《公羊》三世考之，则立于定、哀之日也……始犹托寄微词，旋复钩牵隐语。”^{[4] (P1365)} “志而婉，微而昭”的“《春秋》遗法”^{[3] (P1122)}，“隐而微”的修辞指向，实为“显而著”的诗人之心。如，《胡致果诗序》明确写道：“《春秋》有变例，定、哀多微词。史之大义，未尝不主于微也。二《雅》之变，至于‘赫赫宗周’，‘瞻乌爰止’，《诗》之立言，未尝不著也。扬之而著，非著也；抑之而微，非微也。著与微，修词之枝叶，而非作诗之本原也。”^{[4] (P801)} 诚然，在钱谦益的诗学体系中，作诗之本原为灵心、世运、学问，“变例”“微词”属修辞技巧和表达策略，也是彰显诗心的媒介。

虞山诗人以其广博的知识储备，调动多重修辞策略，将诗人之心包裹在重重“隐谜”之下，形成了独特的写心艺术。其大者有四。一曰纪年。中国古代主要有年号、干支、太岁等三种纪年方式，每当易代之际，作者多借年号之书写，暗寓政治倾向。如慧远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末云：“晋元兴三年岁次阙逢，于时天子蒙尘，人百其忧。”^{[35] (P272)} “阙逢”系太岁纪年，干支为“甲”，即元兴三年（404）。元兴二年（403）十二月，桓玄篡晋自立桓楚，年号永始。故元兴三年亦为永始二年。慧远此书，实尊晋而抑桓楚，故被钱谦益誉为《春秋》笔法，“书晋元兴三年，黜永始，并黜太亨也，此一字书法也”^{[4] (P1428)}。同样，虞山诗人入清后多不书清朝年号，以干支、太岁代之。此中微意，与慧远如出一辙。二曰夷地风物。

出于“尊周攘夷”之笔法，他们借夷地名物、掌故、风俗代指清朝。细而剖之，则有夷语音译类，如“地更区脱徒为尔，天改撑犁可耐他”之“区脱”“撑犁”；有夷族音乐类，如“白翎雀断海青过，蜀魄啼如来路何”，分别指元代教坊乐《白翎雀曲》和女真新声《海青擎天鹅》。再如夷族风俗之“诈马”“只孙”，夷族名物之肃慎、骆驼，皆于文外见深意。三曰星象。观星象以通天人，本为史家职责。他们“仰占俯视，以佐时政，步变撝微，通洞密至，采祸福之原，睹成败之势”^{[36] (P3214)}，因星象之变异而谏言献谏，补察时政。钱谦益以史官自命，其内心隐忧亦多借星象明之。据初步统计，《初学集》《有学集》收录诗歌，借用星象者 400 余处。诸如“招摇”“梗河”“玄戈”“旄头”“狼星”等象征胡汉战争的星象构成星象群，隐喻军事政局变动，寄寓反清复明志。然而，对虞山诗派“度辞隐语”内蕴的发掘，却任重而道远。

综上所述,在钱氏家族的带动下,虞山诗派拥有绵延百余年的《春秋》学传统。他们基于自身的学术实践,构建通经汲古之学,造就了虞山诗学的学人气度,有助于清代考据传统的生成。他们秉持由经入史、兼及子集的诗学进路,倡导诗史圆融,建构杜甫的“诗史”典范,并通过史书编撰和诗文创作付诸实践。基于“隐而微”的《春秋》大义,他们借径李商隐以学杜甫,以“隐迷”之笔抒写明清之际的心灵感触,体现出较为高超的写心艺术。可以说,虞山诗学重学问、重史、写心,与《春秋》学传统有着天然联系,对清代的学术传统和诗学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罗时进.清代虞山诗派的创作气局[J].江苏社会科学,2002,(3)
- [2](清)钱谦益.牧斋杂著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.
- [3](清)钱谦益.初学集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.
- [4](清)钱谦益.有学集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.
- [5]佚名.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进士序齿录[Z].明万历刻本.
- [6](明)张溶.明神宗显皇帝实录[Z].台北: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校印本,1963.
- [7]陈开林.《钱牧斋全集》所收《春秋胡传翼序》辨误[J].图书馆杂志,2019,(6).
- [8](清)钱曾.藏园批注读书敏求记校证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2.
- [9]毛文鳌.钱陆灿研究[D].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,2012.
- [10](清)钱陆灿.(康熙)常熟县志[Z].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.
- [11]佚名.明万历二十七年壬辰科进士历履便览[Z].清淄川毕岱燧寒碧斋抄本.
- [12](清)永2).四库全书总目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- [13]周小艳.冯舒、冯班研究[D].保定:河北大学,2013.
- [14](清)冯班.钝吟杂录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3.
- [15]佚名.明崇祯七年甲戌科进士三代履历便览[Z].明崇祯刻本.
- [16](清)严熊.严白云诗集[M].清代诗文集汇编:第100册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.
- [17](清)阎若璩.潜邱札记[M].清代诗文集汇编:第141册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.
- [18]张循.谁是清学开山祖?——从阎若璩论钱谦益看清明之际考证学的兴起[J].清史研究,2017,(4).

-
- [19]梁启超. 饮冰室合集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5.
- [20] (清) 钱曾. 钱遵王诗集校笺[M]. 谢正光, 校笺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8.
- [21] (清) 钱良择. 抚云集[M]. 清雍正八年刻本。
- [22] (清) 顾苓. 塔影园集[M]. 李花蕾, 点校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4.
- [23]陈寅恪. 柳如是别传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20.
- [24] (清) 钱谦益. 钱注杜诗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9.
- [25] (清) 陈璧. 陈璧诗文残稿笺证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4.
- [26]钱仲联. 清诗纪事[M]. 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04.
- [27] (清) 王应奎. 海虞诗苑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3.
- [28] (清) 阮元. 十三经注疏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9.
- [29] (清) 皮锡瑞. 经学历史[M]. 上海: 上海书店, 1996.
- [30]严志雄. 钱谦益的“诗史”理论与实践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9.
- [31] (清) 钱龙惕. 大宪集[Z]. 1919 年木活字本.
- [32]郭绍虞. 宋诗话辑佚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.
- [33]刘学锴. 李商隐资料汇编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1.
- [34] (清) 王应奎. 柳南续笔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.
- [35] (南朝梁) 僧祐. 弘明集校笺[M]. 李小荣, 校笺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3.
- [36] (南朝宋) 范晔. 后汉书[M]. (唐) 李贤, 注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5.

注释:

1 关于虞山诗派的形成、演变及其诗学思想, 参见: 何振球《论虞山诗派的形成、发展及诗论》(《扬州师院学报》社会科学版 1987 年第 3 期), 罗时进《清代虞山诗派的创作气局》(《江苏社会科学》2002 年第 3 期)、《清初虞山派诗学观分歧及其影响》(《文艺理论研究》2005 年第 5 期), 李荋民《清虞山诗派诗论研究》(2007 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), 赵炜《明末清初虞山诗学研究》(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)。

2 参见：孙之梅《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（增订版）》（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），严志雄《钱谦益的“诗史”理论与实践》（中华书局 2019 年版），吴海兰《钱谦益经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探究》（《郑州大学学报》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4 期）。